Art Research Letters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15-621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rl
https://doi.org/10.12677/arl.2026.154083

《利刃出鞘》的符号叙事与意义重释

——基于罗兰·巴特符号学的文本分析

罗玉平

重庆邮电大学传媒艺术学院，重庆

收稿日期：2026年10月11日；录用日期：2026年11月2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12日

摘　要

本文以罗兰·巴特符号学为理论入口，对《利刃出鞘》(*Knives Out*, 2019)中的空间、物件、人物及语言进行文本细读。文章关注的并非符号“代表什么”，而是这些可见形式如何在叙事过程中逐步获得财富、血缘、身份与家庭归属等文化含义，并被组织为具有自然性外观的秩序。研究发现，庄园、餐桌、刀具与日常器物共同参与了资源占有关系的可视化；家族称谓和亲情话语则将利益诉求转译为伦理判断。与此同时，影片并非单向度地完成意义建构：喜剧式夸张、人物自相矛盾的言行与侦探叙事的反讽结构，使既有意义在被确认的同时不断暴露裂缝。借助玛塔的身份位置、遗嘱安排和情节反转，影片最终使原本看似稳固的继承逻辑发生位移。本文据此认为，巴特理论能够有效揭示电影符号的二级意指过程，但需结合类型惯例、视听语言与观众接受加以限定；《利刃出鞘》的悬疑机制正是在建构、扰动与重释之间，呈现出复杂的意义运动。

关键词

罗兰·巴特，《利刃出鞘》，符号学，意义建构，叙事反讽，电影文本

Symbolic Narrative and Meaning Reconfiguration in *Knives Out*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Yuping Luo

School of Media Arts,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Received: October 11, 2026; accepted: November 2,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12,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Roland Barthes's semiotics, this article conducts a close reading of spatial settings,

文章引用: 罗玉平. 《利刃出鞘》的符号叙事与意义重释[J]. 艺术研究快报, 2026, 15(4): 615-621.
DOI: 10.12677/arl.2026.154083

objects,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in *Knives Out* (2019). Rather than asking what a sign simply "stands for",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visible forms gradually acquire cultural meanings related to wealth, kinship, identity, and familial belonging, and how these meanings are organized into an apparently self-evident order. The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mansion, dining table, knives, and everyday objects visualize relations of resource possession, while kinship terms and affective discourse translate material claims into ethical judgments. Yet the film does not construct meaning in a one-directional manner. Comic exaggeratio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haracters' words and actions, and the ironic structure of detective fiction repeatedly expose fissures in the meanings being established. Through Marta's position, the will, and narrative reversals, the film ultimately displaces what first appears to be a stable logic of inheritanc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Barthes's framework is useful for explaining second-order signification in cinema, but it must be qualified by genre convention, audiovisual form and audience reception. The suspense mechanism of *Knives Out* thus unfolds through a dynamic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disrup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Keywords

Roland Barthes, *Knives Out*, Semiotics, Meaning Construction, Narrative Irony, Film Tex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利刃出鞘》(2019)由莱恩·约翰逊执导并编剧。影片以小说家哈兰·斯隆比死亡后的调查为主线，将侦探推理、家庭冲突和遗产争夺编织进同一叙事结构。与以案件复原为主要目标的传统侦探叙事相比，影片将人物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身份差异置于谜案内部，使"谁在说谎"与"谁有资格继承"构成彼此牵连的问题[1]。庄园、餐桌、书房、杯子以及人物称谓等，因而不只是推动情节的视觉元素，也成为意义持续累积的节点。

从符号学进入这部影片，可以将电影理解为由视觉、物质与语言共同构成的意义网络。巴特的理论尤其适合解释从具体物象通向文化价值的过程：空间首先是空间，物件首先是物件；但当它们被置入人物关系、镜头组织与叙事语境时，便会附着关于财富、身份与家庭归属的意义。本文并不将符号视作固定的"密码"，而是考察其意义如何生成、被重复，并在影片的反转与反讽中被重新打开。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批判性对话与研究定位

现有《利刃出鞘》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从侦探电影类型出发，讨论影片对谜案结构、叙事节奏与破案视角的改写；第二类聚焦暴力编码，或从人物形象与主题表达切入；第三类以符号学为路径，对视觉与物质符号进行阐释[2]。国外研究则将庄园置于犯罪类型史的脉络中，强调封闭空间与悬疑叙事的关联[3]。这些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也呈现出两项可继续推进之处：其一，类型、空间、道具与人物常被分别讨论，较少追踪它们如何在同一叙事链条中协同生成意义；其二，已有符号学解读多侧重对象的象征指向，对影片如何借由喜剧、反讽与情节反转扰动既有意义，讨论尚不充分。

关于巴特的研究已指出，符号不仅传递信息，也能够在大众文化中参与价值判断与稳定意义的形成[4]。不过，若直接把这一理论移植到电影文本，容易将镜头、表演和类型节奏简化为单一的观念说明。

本文据此既吸收相关研究对巴特二级意指的阐释，也对其进行方法上的限定：不把电影意义视为预先封闭的结论，而将其置于视听形式与侦探类型的运作中考察。相较于郑赛赛对侦探叙事策略的关注、冯琳卓对暴力编码的分析和张子扬对符号对象的梳理，本文进一步讨论空间、物件、人物与语言如何相互连接，并重点揭示喜剧和反讽如何使既有解释失稳。由此，本文的贡献不在于为单个道具补充新的象征意义，而在于提出一条“符号组织–意义稳定–反讽扰动–意义重释”的分析路径。

1.3. 研究问题

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利刃出鞘》如何通过视觉、物质、人物与语言符号组织关于财富、血缘与家庭归属的意义？第二，影片如何借助喜剧、反讽、叙事反转和身份转换，使这些意义从看似稳定转向可被重新解释？

1.4. 研究方法与分析路径

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与符号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影片中的典型场景、道具、人物和语言为主要材料[5]。分析路径为：“电影符号 → 能指/所指 → 外延意义 → 文化内涵 → 意义稳定 → 反讽与叙事反转 → 意义重释”。该路径旨在避免把电影符号研究停留于简单的“象征意义”罗列，而是进一步追问：某种理解为何会显得顺理成章，又如何在具体文本中被扰动。

1.5. 研究意义

理论层面，本文尝试将巴特的二级意指与多义性概念用于当代电影分析，并结合侦探类型的反讽机制，说明符号分析在影视文本研究中的解释力及其边界。实践层面，本文通过分析空间、物件、人物与语言的协同关系，为悬疑电影研究提供一条由形式分析走向叙事意义分析的路径。

2. 罗兰·巴特符号学理论框架及其电影分析边界

2.1. 能指与所指

索绪尔将语言符号理解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前者指可感知的形式，后者指与之相连的概念[6]。巴特沿用这一关系，同时将分析对象扩展至服饰、广告、摄影及其他文化文本。置于电影之中，建筑形制、服装、杯子或人物动作均可先作为形式出现；但这些形式进入具体叙事后，会因人物关系、镜头安排和文化背景而获得超出表层描述的意义。因此，本文将“能指–所指”作为分析起点，而非终点。

2.2. 外延与内涵

在第一级意指层面，符号具有可直接描述的意义；进入内涵层面后，同一对象又会关联某种文化经验与价值判断。例如，庄园首先是一处住宅，其次才可能被读作财富积累、家族声望或内部边界的象征。内涵并非物体固有的属性，而是在社会语境与文本组合中生成的意义。电影通过反复调度这些符号，使抽象的资源分配关系获得可见形态。巴特在《符号学原理》中对意指层次的说明，也提示研究者应将对象的可见形式与其在具体语境中生成的文化含义区分开来[7]。

2.3. 二级意指与意义稳定

巴特所谓“神话”，重点不在古老故事本身，而在一种二级意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的符号被再次利用，成为表达更高层次文化价值的能指。在这一过程中，具有历史条件和社会来源的关系可能被呈现为自然、普遍和理所当然的事实。放入影片中，血缘继承、个人奋斗和家族荣誉都可能被组织为具有稳定外观的叙事判断。本文沿用这一思路，但为避免术语重复，以下主要使用“意义稳定”或“既有叙事

判断”等表述。作为理论原典，巴特在《神话学》中对日常文化对象的分析，为本文理解庄园陈设、家族话语和日常器物如何获得附加意义提供了直接参照[8]。

2.4. 多义性与意义解码

电影符号很少只有单一解释路径。一个杯子既可以是日常用品，也可以因构图、人物使用方式和情节位置而关联占有、身份或权威。本文所说的多义性，主要指符号意义会随叙事位置变化而重新配置。尤其在影片后半段人物关系和利益格局改变后，前半段建立的符号意义会被迫改写；这种变化为意义重释提供了文本内部条件。

2.5. 巴特理论用于电影分析的适用性与挑战

巴特理论的优势，在于能够解释电影如何将可见形式转化为文化判断：庄园、刀椅或“MY HOUSE”马克杯并非孤立物件，而是在叙事中被组织为具有附加意义的符号。它也有助于分析影片如何使某些关系显得自然、正当或无需证明。麦茨关于电影符号系统的讨论进一步提醒我们，电影意义并不由单个画面独立完成，而是在影像、声音与叙事组织的关联中形成[9]。

但电影并非静态图像。其意义同时受到表演、摄影、剪辑、声音、类型预期和观众经验的影响。波德维尔、汤普森关于电影形式与风格的论述表明，镜头组织、表演节奏和声音设计会共同影响观众对叙事信息的理解[10]。尤其《利刃出鞘》带有显著的喜剧与反讽色彩：人物越以严肃语气维护家庭体面，其自利言行越可能制造反差；侦探类型的误导、延宕和翻转，也会迫使观众不断修正判断。因此，本文不把巴特理论作为唯一解释框架，而将其与类型叙事和视听表达结合使用。本文的结论仅说明影片提供了何种意义结构，并不据此推定所有观众都必然形成同一理解。

2.6. 分析框架：从符号组织到意义重释

综合上述概念，本文将影片符号分为场景、道具、人物和语言四类，依次考察其外延意义、文化内涵与叙事功能，再分析喜剧、反讽和情节反转如何改写其关系。由此，符号不再是静态的“象征物”，而成为意义被组织、被稳定并被重新解释的动态节点。

3. 《利刃出鞘》的符号系统与意义建构

3.1. 场景符号：空间秩序与进入边界

哈兰家族的庄园是影片中最具辨识度的空间。建筑尺度、封闭的出入口和密集的室内陈设首先构成富裕家庭的居住环境；进一步看，这些形式将财富、家族历史和内部边界集中于同一空间。庄园不仅展示富裕，也区分谁能够自由出入，谁只能以受雇者或访客身份出现。正如有关庄园与犯罪叙事的研究所提示的，封闭场所既制造悬疑，也为人物关系的集中对峙提供条件。在本片中，遗产争议发生于庄园之内，使资源分配看似只是家庭内部事务，却不断显露其排他性。

书房与餐桌则将空间秩序进一步具体化。书房关联哈兰的创作活动、私人收藏与家庭权威，因而带有知识和资源控制的意味；餐桌将家庭成员安置在一个高度可见的共同空间中。人物在此谈论父亲、传统、诚实与亲情，语言与座位秩序相互配合，使继承问题获得伦理色彩。空间并未直接宣布“谁拥有权威”，而是让权威在日常生活的形式中显得顺理成章。

3.2. 道具符号：财富、危险与占有关系的可视化

刀具、座椅、杯子等物件同时处在生活用品与叙事道具的双重位置。刀具直接关联案件的危险，又

与庄园内部的精致陈设并置，形成危险与财富彼此靠近的视觉关系。刀椅尤其具有双重性：它既是装饰性家具，又由大量刀刃构成，使“坐在中心”的想象与潜在伤害同时出现。冯琳卓关于影片暴力编码的讨论指出，暴力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被纳入叙事组织之中；本文进一步认为，刀椅将这种组织转化为可见、可触的形式。

“MY HOUSE”马克杯的意义来自其日常化特征。字面上，它只是带有所有权表达的杯子；但当它反复出现于家族空间中时，“我的”这一占有语气便与房屋、家族和资源控制相连。与刀椅的强烈视觉刺激相比，马克杯以更轻微、更生活化的方式呈现占有逻辑。影片通过杯子、酒杯等物件与人物的同框关系，使日常器物逐步嵌入身份和权威的叙事之中。这也补充了既有符号学研究对单个视觉符号的梳理：物件的意义并不只来自其形状，而来自其反复出现时与人物关系、情节节点的组合。

3.3. 人物符号：玛塔的临界位置

玛塔处于影片人物关系的临界位置。她是哈兰的护理员，又因移民家庭背景而与斯隆比家族存在显著的社会身份差异。家族成员在情感表达中可以将她纳入“自己人”的范围，但在遗产和利益问题出现时，她又迅速被置于外部位置。这种接纳与排斥的反复，使其人物身份成为观察家庭边界的窗口。

玛塔并非某个抽象社会类别的简单代言人。更重要的是，她让原有意义体系显现出难以消除的矛盾：她因照护劳动获得道德认可，却没有与家族成员相同的继承预期；她被称为家人，却不被默认拥有家人的权利。随着剧情推进，这一位置变化反过来影响庄园、遗产和血缘等符号的意义，使此前看似稳定的关系失去确定性。与侧重人物形象和主题的研究相比，本文强调玛塔的意义并非固定在“善良照护者”这一人物标签，而是在叙事不断调整其归属位置的过程中形成。

3.4. 语言符号：亲情话语与利益表达

影片中的亲情话语经常与经济利益同时出现。“我们是一家人”“父亲教会我们诚实”等表达表面上指向家庭伦理，但在遗产争议的语境中，也承担重新解释利益诉求的功能。人物可以借助家庭、传统和父亲的名义，使对财富的要求呈现为道德上合理的主张。语言由此不必直接命令，而是通过价值词汇规定何为“正常”、何为“应得”。

这种语言机制与二级意指过程彼此呼应。当“家庭”“成功”“奋斗”等词汇被反复使用时，具体的财富关系容易被抽象为普遍价值。影片的讽刺性恰来自这种错位：人物越强调亲情与公平，其行为越显示出对财产的执着。语言因此既参与既有意义的建立，也在前后矛盾中暴露其裂缝。

4. 从意义建构到意义重释

4.1. 家族叙事：血缘与继承的稳定化

影片前段逐步形成关于家族继承的稳定想象：斯隆比家族拥有财富和社会声望，家族成员似乎因此天然具有继承资源的资格。庄园、聚餐和家庭称谓不断重复这一秩序，使“财富属于家族”呈现为无需论证的常识。按照巴特的思路，这种稳定感并非自然事实，而是多种文化符号共同作用的结果。

4.2. 成功叙事：身份与财富的合理化

与家族叙事相伴的，是“成功者”对自身处境的解释。家族成员倾向于以能力、奋斗和个人成就说明财富的合理性，却较少正面面对继承、家庭资源和既有社会位置发挥的作用。于是，“已经拥有财富”被转化为“本来就配得财富”。影片通过争执与利益冲突不断让这种说法与人物实际行为发生摩擦，使其不再显得无条件成立。

4.3. 玛塔的进入：既有判断的裂缝

玛塔的存在使这套关系出现难以消解的矛盾。她可以在情感上被称为家人，却不能因此自动获得与家族成员相同的权利；她的劳动受到认可，但她的身份仍在互动中被标记为不同于家庭核心成员。正因为这两个判断同时存在，影片才将隐藏在日常称谓中的边界显露出来。玛塔并非简单站在家族之外，而是处于“被纳入”与“被排除”的中间地带。

4.4. 喜剧、反讽与符号反转：意义如何被扰动

如果只以二级意指的稳定化过程来阅读影片，容易忽略《利刃出鞘》的类型气质。影片并不以严肃、单线的方式建立家族权威，而是借助夸张表演、互相推诿的对白和人物自我形象与实际行为的落差，持续制造喜剧效果。这种喜剧并非仅服务于娱乐：它通过放大人物言行的不协调，使观众察觉亲情、成功和体面等话语与具体利益之间的距离。换言之，反讽一面加速符号意义的建立——因为反复强调会增强可辨识性；另一面又让这种意义难以完全封闭——因为夸张和矛盾会提醒观众它正被表演出来。

结尾的情节反转重新安排前文符号之间的关系。庄园不再只是财富与家族权威的展示空间，而成为既有继承安排受到挑战的场所；血缘不再能够自动推出继承资格；玛塔从照护者和外来者的位置转向财产关系的核心，使此前关于“谁属于这里”的判断发生改变。关键不在于某一符号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而在于原有意义的稳定性被打破。

从这一角度看，影片的意义运动可概括为“建立－稳定－扰动－重释”。前半段通过空间、物件、人物和语言将财富与血缘联系起来，再将这种联系包装为家庭秩序；后半段则利用遗嘱、身份变化和叙事反转，使这一联系重新暴露为有条件的社会安排。所谓重释，并非将原有意义全部取消，而是让被遮蔽的条件、利益与选择重新进入观众的解释范围。

4.5. 理论反思：巴特框架的解释力与限度

巴特理论能够有效说明影片如何将财富、血缘和身份组织为具有稳定外观的意义，但其解释也有边界。第一，文本分析只能说明影片提供了怎样的意义结构，不能直接判断所有观众都会产生相同理解；观众的文化经验与类型熟悉度会改变解读路径。第二，电影意义受到表演、摄影、剪辑、声音和导演风格共同影响，仅以符号学解释难以穷尽这些维度。第三，本片的喜剧与反讽提醒我们，符号的重复并不总是导向意义的巩固，也可能成为自我拆台的机制。因而，巴特理论更适合作为本文的核心工具，而非影片意义的唯一说明。

5. 结论

5.1. 主要发现

本文以巴特符号学为主要框架，考察《利刃出鞘》中的空间、物件、人物与语言。分析显示，庄园和餐桌将家庭边界转化为可见的空间秩序；刀具、座椅和杯子将财富与潜在危险嵌入日常物质环境；玛塔以身份上的双重位置呈现“内部成员”与“外部位置”的矛盾；家庭话语进一步将利益诉求转译为伦理判断。不同符号由此共同参与了关于财富、血缘与成功的意义建构。

影片的关键不止于呈现既有意义，更在于随后扰动并改写它。通过喜剧反差、人物言行矛盾、遗嘱安排、身份转换和情节反转，原先被视为自然的继承逻辑被重新置于具体条件中审视。由此，影片使“血缘－资格”“财富－能力”之间原本看似必然的联系失去稳定性，也使意义建构过程本身成为可被观察和质疑的对象。

5.2. 理论与实践启示

理论上，将“符号形式–文化内涵–意义稳定–反讽扰动–意义重释”作为连续链条，有助于避免电影符号研究停留于单一物象的象征解释，并将形式分析与叙事结构关联起来。实践上，《利刃出鞘》说明类型电影的悬疑机制可以与社会观察并行：案件推进和叙事反转不仅制造悬念，也改变观众对身份、财产与家族秩序的理解。

5.3.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文采用单片文本细读，结论主要针对《利刃出鞘》这一具体文本，不宜直接扩展为所有悬疑电影的普遍规律。同时，文章尚未系统纳入观众评论、影评文本和数字平台二次创作。后续研究可扩大影片样本，并结合不同类型的接受材料，考察符号意义如何在不同社会语境中被重新解释与传播。

参考文献

[1] 郑赛赛. 《利刃出鞘》与侦探电影叙事策略探索[J]. 电影文学, 2020(21): 138-140.

[2] 张子扬. 电影《利刃出鞘》的符号学阐述[J]. 声屏世界, 2020(8): 53-54.

[3] Gonzalez, A. (2023) Mysteriously Murderous Manors of Crime Fiction: An Examination of Setting in Knives Out. *Digital Literature Review*, **10**, 75-84. https://doi.org/10.33043/dlr.10.1.75-84

[4] 龙佳解, 陈磊. 论罗兰·巴特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从“神话学”到符号学的转换[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8(10): 166-172.

[5] 解传博. “空无”的意义: 罗兰·巴特符号学思想[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1): 56-64.

[6] 屠友祥. 罗兰·巴特与索绪尔: 文化意指分析基本模式的形成[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 42(4): 7-14.

[7] [法]巴特. 符号学原理[M]. 李幼蒸,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8] [法]巴特. 神话学[M]. 许蔷蔷, 许绮玲,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

[9] 李恒基, 杨远婴. 外国电影理论发展的轨迹——序《外国电影理论文选》[J]. 当代电影, 1995(1): 27-35.

[10] [美]波德维尔, [美]汤普森. 电影艺术: 形式与风格[M]. 曾伟祯,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5.